

郑伟 主编

边界方言语音 与音系演变论集

BIANJIIE FANGYAN YUYIN
YU YINXI YANBIAN LUNJI

中西書局

张吉生 杨一凡 晋豫边界鹤壁地区“子”变韵的音系理据·····	241
刘泽民 从音类格局看方言接触导致的音系演变·····	250
王为民 汾河片中原官话梗摄三四等白读的早期形式·····	262
吴永焕 接触与汉语方言声调的演变·····	274
郑 伟 入声音节在方言接触中的表现·····	288

后记·····	299
---------	-----

晋豫边界鹤壁地区“子”变韵的音系理据

◎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张吉生

◎ 美国南加州大学语言系 杨一凡

jszhang@english.ecnu.edu.cn

摘要 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晋方言区的“子”变韵现象一直是方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关注的话题,学界对“子”变韵是如何从早期的“子”缀音节演变成现在的宿主音节变韵形式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文章结合晋语其他地区“子”缀音节的历时音变,以音系标记性理论为依据,系统分析了鹤壁地区“子”缀和“子”变韵的不同形式,揭示了“子”变韵的历时音变轨迹和音系理据。

关键词 “子”缀,变韵,标记性,弱化

1 引言

所谓“子”变韵就是原来名词后的“子”缀通过声母脱落、韵母弱化音变成名词韵母的一部分。例如普通话中的“桌子”([tɕuo. tsɿ])、“椅子”([i. tsɿ])、“孩子”([xai. tsɿ])等在河南鹤壁地区均通过变韵的形式来体现,分别读作[tɕou], [iou], [xiau]。这类音变主要存在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以及山西东南部交界处的一些方言中。这种音变现象一直受到汉语方言学界的关注,已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但已有的研究主要以描写为主(乔全生,1995;王洪君 2004;陈宁,2006;牛顺心,2008;张慧丽,2011;郭建华,2012等),缺乏系统理论解释。河南地区的“子”变韵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加缀的过程,即音段型词缀[u]被添加至词根,用以表达“子”缀的语法意义,同时引起一系列音系变化。就该现象的历时演化来说,还有两个主要问题尚未解决。第一,“子”变韵是否真的源于后缀“子”。有人(王临惠 2013: 308—315)认为,所谓的“子”变韵形式(韵尾-u)其实变自“头”缀,并非“子”缀。第二,如果“子”变韵确实源于“子”,那么从独立成音节后缀[tsɿ]到变韵音段[u]的演化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本研究主要采集了晋豫边界的河南北部鹤壁地区的方言中

“子”变韵的语音实现,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地区“子”变韵的音变现象,运用音系学标记性理论对“子”变韵的音变进行音系学的分析,揭示其历时音变的规则和音系理据。

2 语料

本研究分析的语料来自位于晋方言和中原官话交界地带的鹤壁地区的方言,其地理位置如下图所示(虚线标示语料采集地的鹤壁地区):



图1 鹤壁地区地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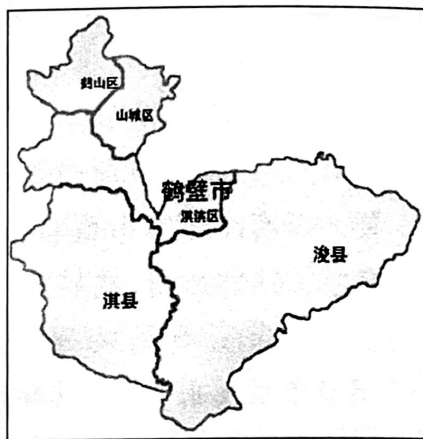


图2 鹤壁市行政区

鹤壁地区位于河南北部,分两县三区,从北到南分别是:鹤山区、山城区、淇滨区(市府所在地)、淇县、浚县。一直以来,学界和社会有一个共识:鹤壁市分属晋豫两种方言区,鹤山区、山城区淇滨区和部分淇县地区属晋方言区,浚县和淇县部分地区属豫方言区。为明确中原地区的“子”变韵到底来自“子”缀还是“头”缀,本研究专门设计了典型“子缀”语料,如:鼻子、梳子、梯子、孩子、饺子、房子、袋子、瓶子、筷子、柿子、狮子、盆子、兔子、炉子、架子、夹子、茄子、麦子、谷子、车子、绳子、丸子、池子、罐子、棍子、席子、蚊子、秃子、瘸子等词,并深入鹤壁地区各区县的乡村,根据乡村分布情况确定了28位平均年龄62岁(最小47岁,最大80岁)的当地人(23人男性,5人女性,本地出生)为本研究语料采集对象,主要以村民为主,极个别城镇居民。所涉及的28个乡村在各区县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鹤壁地区28个方言点及所在乡镇

编号	方言点	所在区县	编号	方言点	所在区县	编号	方言点	所在区县
A1	后蜀村	鹤山区	B1	姬家山	鹤山区	E1	谭峪村	淇滨区
A2	窦马村	鹤山区	C1	小马村	山城区	E2	洪峪村	淇滨区
A3	杨家庄	鹤山区	D1	东窑头	山城区	F1	桌坡村	淇滨区

图3表明,在鹤壁方言区存在着“子”缀的四种形式:一部分靠近山西省的太行山区基本保留着子尾,读音为[təʔ]或[tə],但[təʔ]和[tə]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分,基本是[təʔ]和[tə]混杂,表明[təʔ]正在经历着喉塞音丢失的过程,但还未完全消失。因此,我们在地图上只标识了[təʔ]音。由于这部分地区还有其它喉塞音结尾的音节,因此而被划分为晋方言区。鹤壁市的大部分地区,“子”已变韵,与名词韵母合为一体,往往韵尾以[u]音结束。东部靠近河北省小部分地方保留着子尾,读本音[tsɿ],明显受河北官话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子”变韵表现形式。该形式在河南的淇县、浚县、封丘、开封等三十多个方言点均有报告(见辛永芬,2006;岳保红,2008;夏俐萍,2012)。在鹤壁方言区的“子”变韵的主要形式如下:

- (1) 桌 桌子; 孩 孩子; 筷 筷子; 麦 麦子
 [tɕuo] [tɕuau] [xai] [xiau] [k^huai] [k^hiau] [mai] [miæu] (淇县)
 [tɕuo] [tɕuau] [xai] [xɛu] [k^huɛ] [k^huɛu] [mɛ] [mɛu] (浚县)

关于中原地区的“子”变韵现象已有不少讨论(如王洪君 2004;王临惠 2013等),但到底变韵后的韵尾[u]音(如语料(1)所示)到底来自“子”缀还是“头”缀,变韵的过程及其音系理据是什么尚未有明确的答案。以下本文将根据所采集语料,结合其它中原地区的已有文献资料,运用音系学的标记性理论揭示鹤壁地区以及其他中原地区“子”变韵的音系规则和变韵的音系理据。

3 “子”变韵还是“头”变韵

王临惠(2013: 308—315)提出“子”变韵来自“头”缀的主要依据是变韵后的韵尾[u]音与“头”[t^hou]的韵尾完全一致。她因此作出了三点(主要)解释:1)中原地区历史上早就有“头”缀的记载,如“馒头”、“指头”、“骨头”、“针头”、“木头”、“鼻头”、“斧头”、“盖头”。2)“头”缀轻(弱)化,音节消失,韵尾[u]音并入名词韵尾,因此有了[tɕuau]“桌头”、[t^hia:u]“条头”等变韵音节。3)有些“头”缀没有进入变韵而保留缀音节,但因轻读而促成为入声,部分方言又因为促声舒化从而丢失塞音韵尾,其演化过程是[tou] > [təʔ] > [tə](后面的两种形式都存在于我们收集的鹤壁地区语料)。

我们认为王临惠(2013)的解释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语料能证明(1)的变韵变自“头”缀。首先,王临惠举例的中原地区早有“头”缀使用的文献也都是普通话中存在的“头”缀用法,没有文献证明普通话中的典型“子”缀(如:饺子、袋子、梯子等)

在中原话中存在有使用“饺头”“梯头”“袋头”等的记载。实际上,中原一带确实到处都有“桌子”“茄子”“孩子”“瓶子”“柿子”“蚊子”等大量这样的“子”缀词汇。一些已有的方言调查表明,与河南北部交界的山西南部 and 西南部,有些地方都还保留着“子”尾词汇(王洪君 1999),而且河南的东南部仍广泛使用“子”缀词汇。因此,就语言接触而言,不可能鹤壁周边地区都用“子”缀,只有鹤壁方言用“头”缀。

第二,根据王临惠(2013)的解释,“头”缀经历了不同但并行的两条变化路径,一条是“头”缀音节消失,韵尾[u]音直接与名词合音形成变韵(如[tɕuau]“桌头”);另一条是“头”缀音节轻读弱化,由[tou]变为[təʔ][tə],这两条音变路径同时存在。这一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鹤壁地区与山西南部一些地区一样同时存在变韵[u]音和[təʔ]、[tə]三种形式,即在一个一定范围的地区,“头”韵同时变韵为韵尾[u]音和变成弱化音节[təʔ]或[tə],这种变化在理论上讲不通。因为不可能一种形式([tou])会同时向两种完全不同方向音变(一种是变韵,另一种[təʔ]>[tə]),触发不同方向音变的动因是什么?实际上,晋语中仍存在着独立的“头”缀。根据王晓培(2015)的调查,同是河南北部的辉县盘上话晋语有“头”缀音节和“子”变韵同时存在的现象,如(王晓培 2015: 81—146):

(2) a. “头”缀

锄头[tɕhu⁵³səu⁰]

耍头[ɕwɐ²³²səu⁰]

说头[ɕwɐ³¹səu⁰]

b. “子”变韵

妹子[mjəu²²]

席子[ɕjəu²²]

鼻子[pjəu²²]

当然,在不同的晋语方言中,也有“头”变韵的现象,如郑州、开封;也有“子”缀保留着独立音节,如平遥等。

第三,根据王洪君(1999, 2004)对山西闻喜地区的方言调查,她发现山西南部“子”缀的音节弱化有三种缀音节形式:[tsəʔ],[təʔ]和[tə]。如果弱化音节源自“头”缀,那么[tou]音节怎么可能弱化成[tsəʔ]音节。根据实际语料和上述分析,我们因此认为变韵不可能源自“头”缀,只可能源自“子”缀。结合我们调查的河南鹤壁地区的语料和王洪君(1999, 2004)调查的山西闻喜地区的语料,我们认为“子”变韵经历了这样不同的历史层级的演变过程:[tsɿ]>[tsəʔ]>[təʔ]>[tə]>[-u]^[1],这些不同形式只是变韵经历的不同历史层级,是一条变化路径中不同

[1] [-u]表示已不自成音节,变成另一个音节的韵尾。当然,在这个演变路径中,也伴随着其他一些缀音节弱化的形式,如[ləʔ]、[tə]等,因与鹤壁地区的“子”变韵无关,不在此讨论,详见王洪君(2004)和王临惠(2013)。

时期的不同形式。

4 “子”变韵是“子”缀音节的标记性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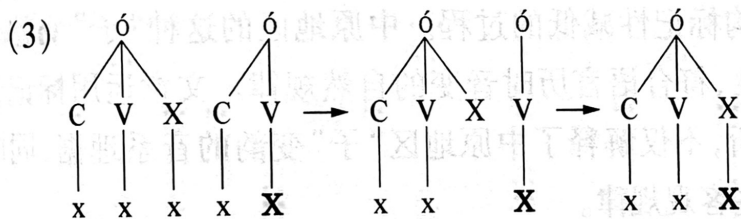
如果语料(1)的变韵源自“子”缀,那么最早的[tsɿ]音节是如何变韵成韵尾-u的?当代音系学的标记性理论(Chomsky & Halle 1968; de Lancy 2006)认为,语言发展的内部机制总是以标记性弱化为动因。根据标记性理论,往往越普遍、使用频率越高、儿童习得越早的形式,或结构越简单的,其标记性就越小,或称为无标记结构。最无标记的三个元音[i],[u],[a];五个元音[i],[u],[e],[o],[a];八个基本元音[i],[u],[e],[o],[ɛ],[ɔ],[a],[ɑ],随着元音数目的增加,标记性就增加。就辅音音段而言有以发音部位决定的标记性(从大到小):舌根>唇音>舌冠>声门;从发音方式而言:鼻音>口腔音;塞擦>摩擦>塞音(de Lancy 2006)。当然,语言的演变动因是复杂的,如果是因语言接触所发,可能结构的标记性会变得更弱,有时内部机制和外部作用同时影响促使语言音变。根据实际语料表现的情况(包括不同形式的分布及相互关系),毫无疑问,中原地区的“子”变韵是一种内部机制促发的音变,因此,其音变的每个历史层级的形式往往都是以标记性的弱化为目的。

如果语料(1)的变韵是“子”缀经过不同层级演变的结果,那么在[tsɿ]>[tsəʔ]>[təʔ]>[tə]>[-u]这一路径中,每一种形式都是通过标记性的减弱表达了缀音节的逐步弱化。首先,第一步[tsɿ]>[tsəʔ]是明显的标记性弱化。根据Meddieson和Disner(1984)的调查,世界上只有很少几种语言有此舌尖元音[ɿ],汉语是其中之一。无疑,元音[ɿ]是一个非常高标记性音段,由于缀音节的弱化,被低标记性元音[ə]所取代。中央元音(schwa)[ə]是最无标记的元音之一,因此在绝大多数印欧语言中,[ə]只能出现在非重读音节。央元音[ə]不仅标记性弱,而且感知度也很低,因此在晋语中不得不后加喉塞音以突显其缀音节的独立性。弱化的“子”缀音节[tsəʔ]在山西个别地方仍有使用(侯精一1985;王洪君2004)。第二步[tsəʔ]>[təʔ]使缀音节的标记性进一步减弱,因为塞擦音[ts]变为塞音[t]无疑使音段结构的标记性大大减低。

众所周知,河南北部(包括鹤壁北部)是晋语区,“子”缀弱化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是什么时候发生已很难考证。根据我们采集的语料,鹤壁地区的“子”缀弱化音节已经是第二步和第三步演变的结果:[təʔ]和[tə],或正在经历着第三步的演变[təʔ]>[tə],鹤壁市的北部地区(包括鹤山区、山城区和淇县的北部)已经出现音

节末喉塞音的丢失。喉塞音的丢失使缀音节进一步弱化,它的表现形式也是标记性的进一步减低,因为就音节结构而言,CV 是最无标记的音节结构。

“子”变韵是“子”缀音节弱化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从缀音节[tə]变成韵尾[-u]音表明缀音节完全弱化,失去了独立音节的身份,“子”变韵的最后形式是合音。合音的现象十分普遍,如普通话中的“甬”(不+用),绍兴话中的“勳”(勿+要),有些方言有“要”(不+要)等。从音系结构看这些合音字(词),其变化规则往往是前字音节的声母与后字音节的韵母合成一个音节,合音字通常是由于高频使用的结果。但“子”变韵的合音与上述合音不同:第一,“子”变韵不是由于高频使用的结果,而是因缀音节弱化导致。第二,“子”变韵合音不合字,书写仍是双字结构,如“桌子”、“孩子”、“筷子”书写不变,但鹤壁浚县读音分别合成为[tɕuau]、[xɛu]、[k^huau]。第三,“子”变韵不是前字名词声母与后字“子”缀韵母合音,而是“子”缀的韵母元音成为前字名词音节的韵尾(往往前字名词原音节的韵母元音保留)合音,如鹤壁浚县的“桌子”[tɕuau]、“孩子”[xɛu]、“筷子”[k^huau]的韵尾[-u]音来自原“子”缀弱化音节的元音。其音系规则可表示如下:



在音系规则(3)的表述中,我们假设前字音节是 CVX 结构,如[p^hæn]“盘”或[xei]“孩”。前字音节也可以是 CGVX 或 CV 都一样。如是 CV 结构([pi]“鼻”),合音后,前字音节末增加一个元音占去 X 的位置,成为前音节末的韵尾。音系规则(3)说明,弱化了“子”缀音节如何与前字名词音节合音形成“子”变韵的过程。

鹤壁地区“子”变韵的语音形式是[u],语料证明变韵前的元音是弱化了“子”缀音节韵核元音[ə]。王临惠(2013)认为,[ə]变[u]中间缺一个环节,因此怀疑[-u]不是“子”变韵,而是“头”变韵。但从特征赋值理论看,[ə]变[u]十分自然。根据规则(2),“子”变韵就是原“子”缀的语法意义通过前字音节末的韵尾音段来实现。而汉语的一个最大音节结构是 CGVX,音节末 X 不是前鼻音[n]或后鼻音[ŋ],就是前高或后元音([i]或[u])。因此,“子”变韵的音段占取的汉语音节末的 X 位置,因此其最后形式只能[i]或[u]。[i]和[u]都是高元音,赋值[+high],这两个音只有舌位前后区别,就是说,汉语音节末 X 位置的元音音段必须具有[+high]特征。而弱化了最后阶段“子”缀音节元音是[ə],赋值[+back],这三个音的对立区别性特征赋值如下:

(4)	ə	u	i
[high]	-	+	+
[back]	+	+	-

对立区别性特征赋值(4)说明[u]的底层只赋值[+high]和[+back],当一个带着[+back]特征的元音进入必须是[+high]的音节末X位置时,就自动生成一个[+high, +back]元音,即后高元音[u],并在表层获得缺省值特征[+round],这就是为什么弱化了“子”缀音节合音后变韵成了韵尾[u]音的音系理据。“子”变韵是“子”缀音节标记性弱化的最后结果。

5 结论

上述分析说明了,河南鹤壁地区南部的淇县和浚县的“子”变韵现象,如语料(1)所示。最早源自普通话的“子”缀,在长期的语言使用中,“子”缀音节逐步弱化,经历了[tsɿ] > [tsəʔ] > [təʔ] > [tə] > [-u]五个不同历史层级的变化,其中的每一步不变化都是音系结构标记性减低的过程。中原地区的这种“子”变韵是语言内部机制促使的历时音变,符合语言历时音变的自然规律。文章运用标记性理论对所采集语料进行的分析,不仅解释了中原地区“子”变韵的音系理据,同时也揭示了汉语历时音变的一些客观规律。

参考文献

- [1] 陈宁,2006,山东博山方言的子变韵及相关问题,《方言》第4期。
- [2] 陈鹏飞,石锋,2008,豫北晋语语音演变研究,《南开语言学刊》第2期。
- [3] 郭建华,2012,山西方言“子”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
- [4] 侯精一,1985,晋东南地区的子变韵母,《中国语文》第2期。
- [5] 刘冬冰,1997,开封方言记略,《方言》第4期。
- [6] 牛顺心,2008,河南武陟方言的子变韵及其形成与发展,《殷都学刊》第3期。
- [7] 乔全生,1995,山西方言“子尾”研究,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8] 沈慧云,1983,晋城方言的“子尾”变调,《语文研究》第4期。
- [9] 王福堂,2005,《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北京:语文出版社。
- [10] 王洪君,2004,从山西闻喜的小方言差异看Z变音的衰变,《语文研究》第1期。
- [11] 王军虎,2012,凤翔方言的子变韵和D变韵,《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
- [12] 王利,2008,晋东南晋语语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
- [13] 王临惠,1993,临猗方言的子尾与子变韵母,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14] 王临惠,2013,晋豫一带方言Z变音源于“头”后缀试证,《中国语文》第4期。
- [15] 王晓培,2015,词基驱动的词库分层模式——来自晋语区方言的证据,博士论文,南开

大学。

- [16] 夏俐萍, 2012, 河南封丘赵岗方言的子变韵, 《方言》第3期。
- [17] 辛永芬, 2006, 河南浚县方言的子变韵, 《方言》第3期。
- [18] 岳保红, 2008, 淇县方言变韵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
- [19] 张慧丽, 2011, 汉语方言变韵的语音格局,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大学。
- [20] 周庆生, 1987, 郑州方言的声韵调, 《方言》第3期。
- [21] Chomsky, N. & Halle. M.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Cambridge: MIT Press.
- [22] de Lacy, P. 2006. Markedness: Reduction and Preservation in Pho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3] Maddieson, I. & S. Disner.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